

廣州文史資料

第七輯

一九六三年第一輯

上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三年四月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印行，旨在積累歷史資料和推進史料征集撰寫工作的開展。所選的稿，多是撰寫者（提供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或雖非親身經歷，但對某一項史實很熟悉，並掌握到第一手材料而編寫的），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這種史料是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提供的，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搜集的史料，包括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个方面，舉凡軍事、政治、經濟、文教、藝術、宗教、民族、華僑、社會生活等的史料，不拘體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實具體而能反映當時重要歷史事件或社會面貌的發展變化者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10519/04

目 录

广州市濠畔街和打铜街的变迁……………沈琼楼(1)

商团与商团叛变

汇丰银行与陈廉伯操纵银业的活动……………潘陆朋(17)

粤商自治会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李蔺泉、余少山(21)

陈廉伯其人与商团事变

……………王昌、罗秉严口述 陈曙风记(37)

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植梓卿、帖子久

谭礼庭、陈子惠、潘希明、崔拜言(46)

发还扣械的经过及其他……………谭礼庭(67)

商团事变知闻忆述……………林志鈞(71)

叶举对商团请援的态度……………陈景吕(78)

商团主要人物的言论及与康有为的关系……………文 琛(81)

商团事变时广州市的錢銀业……………何睦梓(87)

航运业对商团的态度……………梁墨缘(92)

我是怎样参加商团的……………利耀峰(95)

我参加商团的经过……………林 芳(97)

商团事变前后见闻杂记……………卫 恭(101)

对“商团事变”一文的补充订正……………林志鈞(106)

廖案感旧录……………罗翼群(107)

廖案史料补充……………叶少华(121)

清代广州驻防汉軍旗的历史……………杨紹权(127)

清末維新派办书报对士林和场屋之

影响及文瀾书院之活动……………陈曙风(135)

中国改良会.....李衡泉、余少山(144)

广州律师公会的派系背景及其

明爭暗斗.....黎思复、鄺震球(151)

汪伪在粵建警組軍.....陈 樵、陈 鹤(161)

日伪时期陈公博在广州的言談.....陈 樵(165)

广州淪陷时期見聞雜記.....陈伯衡口述 黎思复筆記(168)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郑佩刚(171)

补充与訂正

“广州起义亲历記”一文的补充雷云仙(125)

无政府主义者与世界語的补充王 炎(210)

广州世界語运动回忆和补充更正张亚雄(208)

“溫应星投靠宋子文事迹”的一些补充訂正陈 雷(79)

几点补充和更正陆丹林(16)

对“广东三个綠林省长”一文的訂正.....罗宗堂(70)

对“广州起义笔談”吳幼彭文的訂正.....志 鈞(20)

广州市濠畔街和打铜街的变迁

沈琼楼

笔者祖籍浙江绍兴，寄籍番禺县捕属，幼小时在家族和戚串中，曾及见上一两代的世伯叔和太世伯叔，此辈老人，对于濠畔街西头（濠畔街在今解放南，其东头与高第路口相对，其南则为大新路），特别富于感慨。所以这篇忆述，就从濠畔街说起。

（一）十九世纪时期濠畔街的盛衰情况

据经历过十九世纪中期前期的老人所回溯，濠畔街西约，真可算为广州城中一处了不起的地方，在乾、嘉年间，为华南的经济重心和商业重心。这里繁荣的遗迹，在清末民初还可考见的，尚有好几所当时建筑堂皇、面积占地广阔的会馆遗址，如浙绍会馆、山陕会馆、湖广会馆、金陵会馆、四川会馆等，规模都相当宏大。旅粤徽商，在濠畔街买不到地皮，另在第八甫水脚和下九甫别建徽州会馆两所，湖广新商帮与四川新商帮，后来又各因与其旧商帮竞逐发生矛盾，乃另起炉灶，在清水濠复建有新的湖广会馆与四川会馆。徽商最刻苦，而营运最努力，文化用具全为徽帮所垄断，皖属黟县的墨，宣城的纸、浙湖生产的笔，通归徽帮包运包销。至苏杭的缙綉及名贵的纱罗绸缎高等衣服用品及高等食品金腿绍酒

之类，則浙紹幫与金陵幫均有經營。山陝幫与川幫的运銷以藥材为最主要，此外則为皮草，惟藥材一項，山陝川幫所販之西北西南产品，不能專利。实际上浙紹幫販的貝母、于潛术，（于潛术即于潛县所产之蒼术白术等）、杭州菊花、淮上的枳壳枳实、山薯蕷（淮山別名）等，及湖广幫所販蕲黄辰源間（湖北省蕲水县黃州府，湖南省辰州府、源州府等地方）的國藥，实足以抗衡山陝川云西藥、（当时称山陝川云來者为西藥）、只有最名貴的參茸熊（胆）麝等，則非西土不能获致，而非浙紹幫湖广幫所能与爭者。濠畔街西头，除會館外則为庄口，庄口因兼具发行与貨仓两种作用，是以面积皆极深广，西約南向的一排屋宇，不論为會館，为銀庄（即俗称西号，为山西人所設的貫通全国金融机构，下文另詳。）为各商幫貨庄，因屋后临濠（即环城的旧称玉带河），无从拓展，均购地皮于隔濠对岸之华德里（今日大德西路南边的屋宇即其旧迹），加建崇楼杰閣，作为后座，而自架木桥跨濠以通。大約在距今一个半世紀以前，玉带河西段的水面之深广度，能容納花舫（即設筵招妓之紫洞艇）的來往和灣泊，据传滿清前期笙歌花酒之地，集中于西濠。（即玉带河西段出口处，旧有西水关，濠水穿新城城墙而出，与西濠会合，水关之上即为城壁，此城壁即新城西部太平門衔接老城西南角之繚垣，遺址在今太平北路。）清中叶后，花舫始漸移泊迴瀾谷埠对开的珠江上，成为珠江风月之场。（谷埠者谷物起卸的碼頭，彼时花舫所泊之水面，即现在海珠南路口迎珠街口的长堤路面，未筑堤前，固一片汪洋的珠江水面，六七十岁的老人当犹及见。）广州鶯花薈萃之地，人多知在谷埠与大沙头，但谷埠之前，还有所謂小秦淮者，則惟濠畔街的老土著，略有人能述其迹，今日濠畔街之濠，已盖上路面，

成为涵洞下水道，鮮有知此狭窄阴沟，百五六十年前，能容花舫，号小秦淮也。当日濠畔西約之居住者与营运活动者，既均为外省豪商，而清制仕宦須迴避本籍，是以凡宦粵者俱外省人，每年春节期間，各省旅粵官商，均各假其本籍之会馆以团拜，喝春酒，联乡誼。濠畔西約，一屆新正，即冠盖云集。而各会馆銀庄貨庄后座临流之处，画舫（水上酒舫）蝉联，笙歌鼎沸，灯火荧煌，桥上朱栏，楼头綺戶，一派豪华气象。浙紹、山陝、湖广等会馆門前照壁，均建有戏台，春节由元旦至元宵期間，經常連台演剧。尔时广州尙未建有剧院，梨园卖剧者，除下乡外，在省会惟卖会馆戏而已。

客商帮营运力最雄伟者，惟山陝、湖广、浙紹、徽州与金陵之五帮，除山陝帮經營下文另述外，湖广会馆为两湖客商之集体組織，名义自显。至金陵、浙紹、徽州等会馆，虽仅标榜一郡之名，其实則代表全省或邻省亦有附丽者，金陵与浙紹徽州三帮，殆因首到广州貿迁創業者，为江宁紹兴徽州三府人，三会館原为此三府人所首建。其后苏浙皖人之来穗者皆以三会館为駐足地，实际上苏松常鎮淮扬之人，俱入金陵帮；杭嘉湖宁波溫台之人，皆入浙紹帮；安庐凤潁池太宁国之人，皆入徽州帮。与粵毗邻之閩贛两省，在清初尙未有人在广州执貿易界之牛耳，后来此两省人虽續建有会馆，或在濠畔街內，或不在濠畔街內，然皆规模不大。清中叶前，江西浮梁仍为皖浙閩茶的集散地，徽浙三楚各商帮云集浮梁販茶。該县属景德镇之名瓷，舳舻連接的湖贛江至航路尽处起陆，越大庾岭过南雄，抵韶关，俱用担运，至韶后改用一种河西船載运，沿北江順流下广州卸貨后，轉僱广貨洋貨（十三公行囤銷的洋貨）循来路北运。当时閩贛商尙很少参加此种营运。浙帮中宁波紹兴两府人語音相近（粵人謂为阿拉

話)，理宜情感較為密切，然而甯紹人在商幫中轉成首先破裂，結果甯波人終於脫離浙紹鄉祠，另組甯波會館。（浙幫之甯紹人分裂，是道光年間或以後事，因我所見過的甯波會館與一間厝靈柩的甯波義莊，甯字已改寫作寧，這是道光以後才有這種寫法，因清道光帝名叫旻寧，要避他的皇帝御諱，凡地名上的甯字，一律要改寫作寧。）據說當時各省商幫中，仍推浙幫魄力特雄，能夠不受山陝幫控制，自行組織銀莊，樹立經濟基礎。當時各省客商幫，于營運經濟周轉中，經常須向山陝幫的銀莊所謂西號者通假，至受西號的高利貸盤剝甚深。各客商幫財力不雄，周轉不靈，不得不忍受西號商的重利剝削，獨浙幫却很早即能自拔，竟能自組銀莊與各西號對立。同是貸款經營，浙商對浙號銀莊的通假挪移，取息還較西號略輕，惟根基較遜于西號的雄厚。據前一輩的銀業界浙江同鄉云：同治末光緒初一個期間，廣州濠畔街的浙號銀莊，大受浙銀業巨頭胡雪岩阜生銀莊倒閉的影響，幾家浙號弄成一片倒風，而各西號則屹然不動云。（胡雪岩為清同、光間浙杭的一個暴發銀業家，其暴發之凭借，由太平天國戰事結束時，撫浙的左宗棠，以胡雪岩的阜生銀號承辦軍需，後來左宗棠由閩浙移督陝甘，繼續用兵西北，胡雪岩一貫為左承辦軍儲，凭借左的政治力量，在各省省會和全國商業繁盛的都會，遍設阜生銀莊支店，後忽由北京的阜生銀號被擠兌不能應付，停業關門，遂牽動全國各地的阜生支號同時倒閉，江浙殷富儲戶，多受損失。）濠畔街的浙號銀莊，當阜生風潮波及，究倒閉了若干家，情況不詳，但筆者當清光緒末丙午、丁未、戊申間（1906、1907、1908年，即光緒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所及見的濠畔街浙號銀莊，則只有義善源與源豐潤的兩家，當時此兩家浙號的信用聲譽，遠不能比西號，

无何而义善源首先倒閉，接續源丰潤又因挤提宣告歇业，两浙号撙欠官私款項甚巨，西号則从无倒閉撙欠情事。只有清理来往帳目，收庄歇业返晋省，清中叶以前西号全盛时期，濠畔街究有若干家西号，未能詳知。惟至光緒中叶后，因广东的經濟流轉，已多受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操縱控制所影响，西号在濠畔街的营业受到打击，早多自动結束停业返晋省去，到光緒末年，笔者所犹及见的濠畔街西号，只有蔚泰厚与百川通及新泰厚的三家，是最后收庄者，然亦均在义善源等两浙号倒閉的翌年，相与偃旗息鼓。到宣統年間，濠畔西约里，不論浙号西号的銀庄，都不复有一家存在了。

（二）执銀业牛耳的西号錢庄

西号多系晋人資本，間有陝人参加。各号总司理亦必晋人，副貳（即助手）的伙伴，偶参用陝人而已。清初币制是行用純紋銀的，晋号銀庄东主，往往有一家独資者，拥有純銀达数百万斤。晋省何以有些人会拥有如此大量的純銀呢？从一些清人筆記中，有人臆測过，这些晋号銀庄的东主，总是从发现窖藏起家。山西一省在滿清入关后，制造此大量窖藏者，則为李闖王的闖軍与闖将。当吳三桂借得清兵入关，李闖王迎战于一片石失敗后，返到北京。撤兵向晋陝西退，将沒收明末中央权貴的脏贿，捆載随軍西去。时以輜重煩累，有碍行軍与作战，故在晋省山谷僻处分地窖藏，后因清兵追急，闖軍归陝后再不能返晋，于是此黨来的无数白鏹埋藏不久，为晋人之幸运者发现挖出。此虽臆測之談，惟当年傳說甚熾。

西号銀庄的組織，远在清初康雍間，而大盛于乾嘉，緣清自康雍乾以来，承平日久，物阜財丰，百多年間，一貫行用

的硬幣白銀銅錢兩級制，各省解款都沒有國家匯兌機關，至用伙役抬銀數十百箱，跋涉長途，邪許路上（邪許即扛運者扛抬時的呼聲），更恐綠林截劫，腐朽軍隊，無能護運，至有托庇于鑄局保鑣者。西號銀莊，遍設于京師及各省會，乃創為匯兌交納之法，官僚和商旅咸感其便。各西號銀莊所發的憑單支票，既為全國官商所信用，然銀票只限于千萬兩以上的紋銀匯駁行用，民間交易仍多論錢。銅錢數千文，重量已不易攜帶，當時銀貴錢賤，二三兩銀子只謂之碎銀，尚未成錠。司碼五兩乃為最輕之一錠。但三二兩碎銀已可換銅錢十千，至少亦八千文，硬幣繁重到如此田地，怎能通行？京師西號信用既著，于是又發行錢鈔，市面更樂為行用。道光初年，山西銀莊無形中几成為代表清廷發行鈔票的機關了。時浙江仁和县龔自珍定菴氏抱負經世長才，任禮部主事，極不得志。目擊當時市制混亂，清廷財政拮据，執政者全無辦法，定庵痛心之極，于道光己亥雜詩中寫過兩首七絕，反映出當時社會經濟的實況，其一首云：“作賦曾聞紙貴夸，誰令此紙遍京華？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吏家。”這首是諷刺山西銀莊暗中攘了清廷發行鈔票之權。盈廷飯桶大僚，竟沒有人知其不對的。第二首是：“麟趾裏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漢家平准書難續，且仿齊梁作餅金”。這兩首詩寫于鴉片戰爭發生的前夕，其后不滿十年，廣東方面即爆發了鴉片戰爭。定庵的第二首詩，是早已洞見西洋的低成色銀幣，紛紛流入中國行用，逐漸在市面流通，暗地把中國的純紋銀的銀磚銀錠碎銀塊換取出口，歲歲年年漏卮不塞，為害將不知伊于胡底，所以提倡急行造幣，以為挽救之法。（麟趾和裏蹄，都是南朝齊梁兩代國家製造的銀幣式樣。裏蹄俗稱馬蹄銀。裏音鼻。）定庵自注此詩云：“近世行用番錢，以為携挾

便也，不知中国自有餅金。（见南史褚彦回传，又见唐韩偓诗）”定庵主张政府开厂鑄币，一则为抵御西洋銀币的侵略，其次亦为对内收回晋商西号的控制社会經濟权。西号在乾嘉时，社会上已普遍称为票号，由京师以至各省会的西号，都发行票据，以便居者行者挾携。盖清代戶部銀庫所儲，除銀砖外，銀錠（据见过者言型式一如旧社会祀祖先时所焚化的紙制冥鏹即其雛形）則有伍兩拾兩貳拾兩三十兩伍十兩多种，但发俸給餉，很少用到大小元宝（銀錠又称元宝），用戶部庫秤发碎銀块，裹以草席袋。实际則因八九品以下的末僚，人数至多，月俸均不及伍兩之数，用不到最輕的一枚銀錠。（按清初地方佐貳杂职，如八品的府經歷县丞，从九品以下的巡檢吏目司獄典史等官，年俸只三十余兩。到康熙末因社会物力变动，比开国时提高許多，微員薄俸不足資生活，始年加养廉銀六十兩。）是以戶部的銀砖和重錠，仅成为压庫物，很少发放出来。各西号形成票号之后，其原日自备的銀砖和重量元宝，亦只罗列鋪櫥柜前，装点門面，表示資本充实。伍百兩以上的款目，便多数出票。虽則終日打开大天平，銀声琮琤，倒来倒去，惟支付出入的，仍是三貳百兩以下的少数碎銀块而已。京师的西号，接受各地联号来兌的巨額支票，多数也只是由整化零的換票工作，比方一万元票面，需要拆开一千的若干张，数百元的又若干张，以便使用。用款者为着携挾便利，到西号里都不兌硬幣，只換取小面額凭票，所以龔定庵諷刺詩，有“作賦曾聞紙貴夸，誰令此紙遍京华”之句。西号在首都的經濟势力，比在外省的各地方，尤为蓬勃，单就广州濠畔街的西号來說，其一种放官債的經營手段，一般老广州的人，犹多有知其底里的。在各省的西号是否也通具此种經營作风，姑勿具論，茲先就广州老

一輩人所习知的西号放官債办法說一說。

(三) 西号放官債和錢粮耗羨的內幕

西号銀庄，唯一靠高利貸来牟取暴利，此則尽人皆知之事。但清代广东政界中，凡府厅州县的地方正印长官，却多数入其圈套。在广州試用或候补，久候始得一缺，固毋論矣。即由京师部选或放出，奉旨南来者，或則因京广迢递八千里水陆程途，旅費无着，乃在出都前与京师西号发生交道，揭款始获成行。或則携眷抵广未上任前，已旅囊空空，須呼将伯。因赴任前的幕客长随，舟車仪从，旗牌执事，一切措备，須費多資，清寒之士，初入宦途，告貸乏門，亦惟仰西号，始能壮新官上任的行色。西号的司理人和伙伴，更与一种充大老爷长随隶役的人（清制对那些做过官吏长随仆役的人，认为身家不清白的賤民，本身不得仕宦，子孙不得应岁科考試），沟通拉攏，朋比为奸。所有实缺穷官，沒有資斧赴任的，必須凭这种行业人向西号貸款。（这种行业俗称門上行，門上的意义即司關，但此类人一到州县官衙，所执行的职务，只是总管收支，号称大爷，大爷却自行雇用二爷对县官司洒扫伺应的下役，二爷还雇用仆人名三小子，封建社会的典臣仆，仆臣台階級重重的，）所以一个地方上府州县的正印官，在上任之前，亟須物色罗致的两个人选，第一是办理刑名錢谷的幕宾，謂之正席师爷，第二就是門上大爷，名为門上，其实并不司關而只司賬，多数是代大老爷向西号揭款赴任的仲介人，門上这一角色在衙署中，名則仆隶，实則官长的債权人。地位虽比不上刑錢正席紹兴师爷号称老夫子的尊崇，而实权却掌握全署的財政出納，在西号的制度下，现任官的貸款数目不多，在若干以下的，便委托門上代表收还貸

款。但貸額数量稍巨，逾期不歸款，須息上起息者，則必專派伙伴到署坐索，至扣數收清乃去。西号的討債人員最强悍，政界中的大老爺們，无不畏之如虎，債權人到署，虽有官威都无所施了。一个州县地方长官，年俸不多，合養廉銀計，也不过三數百兩，清中叶后州县官的習慣，在任时都不向省藩庫具領俸廉，此區區之數，亦必留待解任时划抵應解錢糧的一小部分。据說因藩庫發俸廉亦剋扣重重，仅得若干成數之故。一署之內，幕客賓从，輿台侍役，待食于署中者人數繁多，即本官亦自有其眷屬，連俸廉都不具領，難道俱可以吸西風過活？不言而喻。衙門八字開，財源滾滾，有足以养活此署中人者，最正常的錢糧收入有所謂耗羨（收糧人以籬筐載糧代替秤糧，滿載时漏于地者謂之“耗”，盈筐时还要再加，务使超越定額，大約十分二謂之“羨”。）以及開烟開賭的陋規，已成為公開式的正常收入，即不在訟獄上枉法營私，亦可維持署中的公私用度了。門上既為西号債權人的代表，或自身已是債權人，而担当署內的支應職，這類人是不會顧及本官的官常名譽，只知唯利是圖，凡衙門權力所可及的，便無孔不入的去搜刮。尤其是当着西号索債專差到达衙署，本官正一筹莫展時，門上拔草尋蛇的占求財卦，就更來得猖獗了。西号的放官債，十中之一亦間有爛帳的，即債務官之被參革白地，或因病出缺（即死亡），在這兩種情況下，革員既失掉了功名，無可撻拿。因病出缺的，更是一棺附身，萬事俱了，諺所謂人死債爛，但以西号高利貸利上加利盤剝的厉害，十本帳中爛却兩三本，還是無損它的蠶末。門上行业中人，實際上亦多以高利貸致富者，他們也放官債，吃利不如西号之深，且自行出面承当了債權人，主子喜其易与，倍加亲信，俗謂之“帶肚門上”。其特別黠詐者，

不承認自己有錢貸給主人，假手于西号出面充債权人。一切按照西号規律而月月分其高利，此為防范官仆之間，勢份懸殊，無良的主子，鬧起臭官派來存心撻欠，難于追索，故虽自出資本，宁与西号平分春色，收回一半高利，追索時對主子可以毫不假借，無所用其客气了。因西号對於債務官的控制，是向不留余地的。傳聞廣東有一實缺知縣丁忧開缺回籍時，欠下西号一筆爛帳，當時無法清理，到服闋謀起復重過大老爺癮，而欲逃避廣州西号的旧債，到北京吏部投文請求改指他省候補，詎到吏部投文的翌日，廣州西号的北京联号，已派伙伴按址尋到，和他算旧帳，該縣令一計：守孝三年，當中息上所起之息更無法清償，各省省會均有該西号的联号，只要有官在身，便無從逃避，因此迫到罢起復之念，悄悄出都返乡，隱淪終老。各西号對於京部和各省官場聲氣廣通，所以政界中人，從不敢漂它的賬，西号饒有放官債的把握云。

（四）西号在粵放官債的情況

道光前西号的放款，原以濠畔街中各客商幫為主，自從鴉片戰爭後，廣州首先與滬甬福厦同時開埠通商，濠畔街的客商幫，便漸走下坡路，後更一蹶不振，慙慙無生氣，不能如前之巨額營運，故與西号的通挪交易漸稀。西号於道咸以後的經營方法，轉向於大放官債一途，同時因道咸以後，賣官鬻爵，大開捐納之門，報捐的官吏，多如過江之鱗，仕途龐雜而拥挤。尤以廣東素号腴富之省，指分來粵者如蚁赴膻。在穗候補人員之多，遠超過從前，以倍数計。這些挈眷來居五羊作寓公，久候未得一差一缺者，自不得不飲鳩止渴，向西号求挹注。然而西号中人首先打通布政使署（即藩署）吏

房的掌卷老书吏，对于各候补州县人员的履历班别，补缺名次先后，一目了然。对于那些压通班的进士欽点即用知县，和以巨金捐得大花样的遇缺尽先补用知县这两項大老爷，自然首先应酬，要多借多，要少借少。此外分缺先补用班的，和举人大挑一等，已候补多年，名次前列，补缺有望的，也尚可开方便之门，酌情貸給。至于那些补缺无期的試用班劣候补的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便深閉固拒，从不肯有一文的通融了。因为西号的司理，早掌握了一幅粵海升官图，故对于候补官僚的登門求貸者，均能心中有数，所以应付毫无差忒。光緒中叶以后，西号放官債的营业，亦渐走下坡，濠畔街中，已有几家先后收庄返晋。西号虽一般兼办存放款項，然存款定息低微，与貸出的高利定率距离很远，因之向西号附貯款項之戶数无多，每一西号收庄，从无倒欠附戶存款者。据收庄的西号中人言，另有所謂撈蝕銀水之說。

（五）外币流入和粵鄂改設造币厂西号撈蝕銀水

濠畔街最早开业的西号，均有銀砖摆列柜面和客厅，每当碎銀块上天平过兌有不足时，便取銀砖槌敲取碎块来补足。过去广东藩庫亦儲有銀砖压庫，后来因几度交西号汇餉北京戶部，陸續將庫存銀砖都搬送到各西号去，所以西号許多銀砖。后来市面上碎銀块流轉已多，不必随时敲取，銀砖逐漸成陈列品。所以西号历来上兌的碎銀块，都是成色十足的純銀敲出来的，但广州在清初以来，早成华洋杂处的市面，西班牙、荷兰、墨西哥等国的番銀餅多有流入，与碎块紋銀混合上兌。咸丰同治以后，香港已为英国所占，港造銀币侵入广州。重量分三分六厘，七分二厘，一錢四分四厘，七錢二分四种。三分六作五仙用，七分二作一毫用，一

錢四分四厘作二毫用，在广州流布更普遍。七錢二分作為一圓的一種，也混同碎塊紋銀上兌，自從多了這幾種外洋輔幣輕重咸宜的配搭，西號更毋須槌刮銀磚，補充碎銀了。但此種洋銀成色，比紋銀低，大洋開僅有七成的純銀，小洋且不及六成，當時已一律倒上天平混兌，然猶有碎塊紋銀參用。到光緒中，粵、鄂兩省先後將鑄錢局改造幣廠，改鑄銀幣。先造大圓與雙毫單毫三種，以清朝蟠龍旗鑄于幣面，以示別于英帝國主義所鑄造的俗稱鬼頭之港毫。（港幣面所鑄原為英維多利亞女皇側面象，嘉應黃公度遵光緒初香港雜詩所云：

“王面鑄金寶。蠻腰跨革靴”者，即指這些鬼頭港幣。）大圓謂之龍圓，小毫謂之龍毫。自從廣東湖北相繼鑄銀幣，除發庫存舊銀磚，或用地方款購買銀磚，作鼓鑄的基本原料外，并盡量吸收市面流用的散碎純銀塊片顆粒，以助鑄新銀的原料。不十年間，純銀碎片塊，遂絕迹于市面。西號所上天平者，亦惟廣毫、鄂毫與番銀的一般低成色銀子了。這即西號中人所謂“撈蝕銀水”這話所由來。

（六）出口洋莊的崛起和毫銀通行于廣州

咸豐同治年間，濠畔街的徽莊、金陵莊、山陝莊、川莊，多相繼收束，新興的客商幫，尚有津莊、申莊的出現，申莊比較津莊更後，在太平天國戰事完全結束後，滬廣、滬港間諸多商貨往來。然組織上已遠不如從前金陵、徽州、山陝、江浙等幫之強，到光緒間，遂紛紛個別組織的津莊、申莊，且別設于沙基新基新興街、西后街等處。（上述街道，今日多入西堤文化公園範圍。）其原設濠畔街的亦遷出，殘存老字號的舊莊，更慨慨一息，全無生氣了。至通商後出口的洋莊則蓬蓬勃勃的蔚起，設立地點，轉移到河南的洲頭咀、白鶴洲，毗

兴里等处，烟庄、茶庄、蔗庄、糖莞庄之外，更有异军突起的凉茶庄，如源吉林、王老吉之属，每年皆有大宗货物出口，运往新大陆和南洋群岛，虽只是供给海外侨胞的需要，然而吸入海外金钱也弥补国内经济不致出超过巨。此等庄口，所以都设在河南鳌洲（今南华西）的西南一带，是为着靠近白蜆壳英帝国主义的太古码头，这些庄口有支号在香港，这些出口洋庄，自始业时即与西号绝缘，从无交易。在广东未开鑄龙圆龙毫以前，也早以港圆、港毫为进支的单位，数目虽仍有两钱分厘之旧名称，但通常以一百四十元为百两，十四元为拾两，七元作五两，只数元毫，便可凑数，毋须向天平上兑了。毫银时代，不论商场交易，雇佣论薪，或则干脆论元毫，或则虽仍两钱的名称，实支则折合毫银计算，纵有以两钱计的，无论给与者和接受者，都已彼此相忘毫银的两钱，和纹银的两钱原有成色之差别而发生数量的争执。官场中比较认真些的，如司、道、府、厅、州、县长官，聘请西席老夫子的关书，每写明敬奉薪修番银若干两正，标明番银，即是以洋毫为本位之意。在毫银时代，薪工仍以纹银计算的机关，只有海关和邮局，这两机关都是请了洋员代办，高级职员属洋人，月俸总是数百两的。关内局内低级的职员和工役，月入虽有十数两至七八两之微者，均一律伸纹银补水。清末时我有一友人当邮员，月薪三十两，折合毫银原只四十二元，但连纹银补水，便达到五十五元以上。此为纹银与毫洋因成色不同，构成由质影响到量差距一斑。广州造币厂开始鑄的龙毫龙圆，因与港元港毫联系，成色是能与港毫比重的。港小洋只多造单毫，而双毫极缺。广鑄龙银双毫面世后，首先流入港市场，行用达廿余年，港同胞均称便。大约在光绪三十年以前，广毫对港毫及汇丰鈔